

# 戈巴契夫與東歐民主改革

張福昌

(淡江大學歐洲研究所研究生)

## 一、前言

戈巴契夫 (Mikhail Gorbachev) 在一九三一年三月二日生於北高加索斯塔夫諾波區 (Stavropol)，一九五一年進入莫斯科大學法律系就讀；一九五二年加入共產黨；一九七〇年出任斯塔夫諾波區第一書記；一九七一年跳升為中央委員；一九七八年任中央書記出掌農業部；一九七九年任政治局候補委員；一九八〇年晉升為政治局委員；一九八二年十一月起，受到安德洛波夫 (Yuri Andropov) 及契爾年柯 (K. U. Chernenko) 的重用，漸漸掌握領導權；一九八五年三月自契爾年柯手中接下領導共產集團的權杖，開啓了共運史上嶄新的改革新頁。

戈巴契夫從入黨到掌權，約計為黨服務三十三年，他深深了解蘇聯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普遍患有政治體制僵化、經濟發展停滯不前的毛病，因此，乃帶頭興革，圖能起敝振衰，救亡圖存。鄰近的東歐國家<sup>②</sup>受其影響，亦起而大事修補各自殘破不堪的「社會主義住宅」，強烈的「骨牌效應」，使得原無改革意願的史達林主義擁護者，亦搭上改革列車，造成一次全面性的變革。

東歐民主改革與戈巴契夫的關係，就猶如「魚與水」的關係，前者依附後者所提供的客觀環境而得以存活，其間微妙的關係可想而知。因此，當我們在探索東歐民主改革時，就少不了要對戈巴契夫本人作研究，其新政治思維與新東歐政策，實主導著這場轟轟烈烈的改革運動。

註① 在戈巴契夫出任斯塔夫諾波區第一書記期間，幸遇當時執掌全黨意識形態工作的蘇斯洛夫 (Mikhail A. Suslov)，受其提拔，而得於一九七一年不經候補中央委員這個階段，而直接跳升為中央委員。(請參見：蘇起譯，Jérôme Dinnonin 著，「戈巴契夫這個人」，亞洲與世界文摘，第二卷第四期，民國七十四年四月，頁四一)。

註② 本文所稱之東歐國家包括：東德、波蘭、捷克、匈牙利、保加利亞、羅馬尼亞等六國。

四年多來，東歐的改革運動雖然稱不上是一帆風順，成就輝煌，但是也有了些許的具體成果。這些成果對其它相關的國家或地區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未來，主宰東歐改革命脈的戈巴契夫，是否能穩坐領袖寶座？東歐民主改革是否能夠持續不斷？其改革的最大幅度又在那裏？這些都是研究東歐民主改革的有趣問題，本文擬對此作一扼要的分析。

## 二、戈巴契夫的新政治思維及其改革政策的戰略構想

戈巴契夫的新政治思維可以從底下重要的會議、文獻與談話中，看出整個新政治思維的輪廓：

(一)蘇共第二十七次代表大會（一九八六年二月二十五日至三月六日）；

(二)東柏林華約政治協商委員會會議（一九八七年五月二十九日）；

(三)戈巴契夫自傳“Perestroika: New Thinking For Our Country And The World”；<sup>②</sup>

(四)戈巴契夫巡迴訪問東歐各國的演講（一九八八年三月起）；

(五)蘇共第十九次黨代表會議（一九八八年六月二十八日至七月一日）；及

(六)戈巴契夫聯大演說（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七日）。

根據這些資料，我們可以將戈巴契夫的新政治思維歸納為以下八個要點：

(一)以相互依賴取代彼此抗衡的概念。<sup>③</sup>過去，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國家，彼此關係猶如水火般互不相容，相互排斥；現今，戈巴契夫認為，在現今世界中，不論一個國家多麼強大，資源多麼豐富，若不與國際社會建立多邊關係，實不易順利推展國家利益。因此，雙方應在各方面加強合作，互通有無，以謀全人類社會的福祉。

(二)以多元世界取代兩極世界的概念。二次世界大戰後，美蘇兩強分領東西兩大集團，儼然成爲世界的主宰者，國際舞臺上的種種行爲，都可視之爲美蘇勢力的較勁，一切行爲的功與過全都歸於美蘇身上，美蘇兩國就等於是世界的全部。但戈巴契夫認爲整個國際社會並非僅是美蘇兩國的制約，其他國家（例如日本、中共……）、國際組織（例如歐洲共同體、歐洲自由貿易協會、經濟暨合作發展組織……）都有他們的權力中心，並可以對國際社會貢獻他們的力量。

(三)以裁軍撤軍取代軍備競賽。戈巴契夫認爲美蘇兩強無止境地擴充軍備，實已阻塞了通往世界和平的道路，況且一旦爆

<sup>②</sup> Mikhail Gorbachev, *Perestroika: New Thinking For Our Country And The World*, Butler & Tanner, London, 1987.

<sup>③</sup> 洪茂雄，「西歐與蘇聯關係現況——西歐領袖訪莫斯科的意義」，亞洲與世界文摘，第九卷，第六期，民國七十七年十二月，頁六八。

發核子戰爭，則將對美蘇，甚至對全人類社會，產生不可彌補的傷害。因此，戈巴契夫主張透過裁軍談判，同步降低美蘇與美蘇集團的攻擊武力。

(四) 排擠一黨專政，否定共黨壟斷政權的局面。戈巴契夫走訪東歐時一再強調，「任何政黨不可壟斷真理」、「社會主義世界的多樣性」、「東歐可以根據本身條件選擇自己發展的道路」等概念。⑥ 這一再顯示，戈巴契夫已有接受多黨制的準備。

(五) 學習市場經濟，修改計畫經濟制度。過去，蘇聯認為資本主義是罪惡的根源、「走危機」，必須予以根除，否則不能建設共產主義社會的天堂。但戈巴契夫却認為資本主義社會中，並未產生過去所謂「走危機」的跡象，反而坦然地承認社會主義計畫經濟的錯誤，並表示市場經濟有其優越可取之處，值得參考與學習。

(六) 解放意識形態，放棄外交政策意識形態化。過去，共產意識形態是蘇聯集團擴展對外關係的指導原則，各國外交政策皆應循此而訂；戈巴契夫則表示，與第三國交往並非要對方接受共產思想，而只是想藉著談話，以達到協議罷了。

(七) 放棄堅持四大原則，⑦ 力求彼此調和與接納。過去，蘇聯堅持共黨教條式的四大原則，使得各項談判（特別是歐洲裁減核武談判）遲滯不前，戈巴契夫上臺後，力主調和與接納，不再墨守四大原則的老規矩，使美蘇談判得以順利推展，並獲得豐碩成果。

(八) 「歐洲共同家園」(European Common House) 的構想。戰後四十幾年來，西歐國家雖間或有改善東西歐關係的「東進政策」(Ostpolitik)，但因蘇聯對東歐的強硬態度，使這些計畫對改善兩邊關係的貢獻大打折扣。時至戈巴契夫上臺後，採取進取的「西向政策」(Westpolitik)，號召自大西洋岸到烏拉山間建立一個「歐洲共同家園」，讓這個區域內沒有核子的威脅，人人平等，相互尊重，使歐洲成為和平的生存空間。

從以上的分析，我們可以瞭解到，戈巴契夫的政治理念確是不凡，這套新思想不僅影響東西方的關係，而且，更重要的是，已經使蘇聯的東歐政策起了很大的變化。過去，史達林式的「教條主義」和布里茲涅夫的「有限主權論」⑧ 都受到戈巴契夫新政治思維的影響，而被迫宣告停止使用。東歐國家因此獲得更多的自主權，可以選擇自己未來的發展方向。但是，戈巴契夫對東歐這種寬宏大量的舉措，是不是出自真誠？研究共黨問題的專家們對此多持懷疑態度。一般認為，在戈巴契夫的如意算盤中，可能算計著如下三項戰略利益：

(一) 經濟上的利益。戈巴契夫深知蘇聯境內和東歐國家，在中央計畫經濟的主導下，已使經濟發展面臨瓶頸，無法突破。

註⑥ 洪茂雄，「論匈牙利民主化的發展」，問題與研究月刊，第二十八卷第七期，民國七十八年四月，頁二九—三〇。

註⑦ 四大原則乃指：①共黨領導；②社會主義道路；③無產階級專政；④堅持馬列思想。

註⑧ 有限主權論，即所謂的「布里茲涅夫主義」，意指：蘇聯有權干涉東歐國家的內政，以確保社會主義成果。

因此，戈巴契夫乃欲藉這種開放措施，從西方獲取科技、資金與人才的補充，使蘇聯與東歐的經濟獲得改善，進而減輕蘇聯對東歐年約一百億美元的經援負擔。<sup>⑧</sup>

(一)外交上的利益。在外交政策上，戈巴契夫所採行的整體策略是利用蘇聯本身與東歐國家的改革，來達到以下三個目標：第一，淡化美國與西歐的關係，減少美國對蘇聯的威脅；第二，擺脫蘇聯在國際間的孤立地位；第三，爭取國際社會的支持，使助於蘇聯內部的改革。

(二)安全上的利益。戈巴契夫放低姿態，讓東歐國家進行民主化改革，藉此換取西方國家的好感與信任，使國際社會形成緩和氣氛，然後推動裁軍運動，降低北約與華約的軍事對立，化解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在歐洲地區對蘇聯的威脅，於是，蘇聯就可以一方面裁減軍備，節省軍費開支，另一方面又可解除西部國防安全的顧慮。

總而言之，戈巴契夫的改革誠心如何？戈巴契夫的「新東歐政策」是不是一種陰謀？至今，學者、專家們仍有不同的看法。但根據去（一九八九）年底東歐一系列「成功變革」的事實來分析，戈巴契夫新政治思維及其「新東歐政策」的誠意，已經得到世人相當程度的肯定。東歐的「善變」，實應歸功於戈巴契夫的出現，無怪乎，東歐人民會這般慷慨地稱讚戈巴契夫為「東歐的民族救星」了。

### 三、東歐民主改革的演變

戈巴契夫推行改造運動的初期，東歐國家一直在猜測戈氏的誠心，而不敢大膽跟進，放手改革。靜觀三年之後，才於一九八八年起，始邁出改革步伐，其中又以匈牙利身先士卒，首先發難。

一九八八年五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三日，匈牙利共黨召開特別黨代表大會後，素有「匈牙利的戈巴契夫」之稱的葛羅斯（Károly Gósz）繼卡達爾（János Kádár）之後出任黨總書記，引入改革派精英，著手整頓共產黨。一年五個月後，改革

註⑧ 蘇聯對東歐的經濟援助表現在「貿易補助」(Trade Subsidies)和「貸款補助」(Credit Subsidies)上。前者意指，蘇聯對於來自東歐的產品付

以高於世界市場的價格，而賣給東歐的原料，則按低於世界市場價格計算，其間的差價由蘇聯吸收，稱之「貿易補助」；後者則指，蘇聯提供東歐國家低於蘇聯國內貸款利率的優惠條件，鼓勵東歐發展大型工程與經濟合作計畫，而這種低利率的貸款利息損失，亦由蘇聯負擔，稱之「貸款補助」。前者加上後者，就等於蘇聯對東歐經援的總額，根據統計，一九七一年蘇聯經援東歐之總額為二十五億美元，一九八三年則上升到一百二十一億美元，成長四點八倍強，又一九七一年至一九八三年間，蘇聯總共援助東歐一千二百二十三億美元，高於同期美國的一千零九十三億美元對外援助。(參見Crane,

Keith, *The Soviet Economic Dilemma of Eastern Europe*, Rand Corporation, U. S. A., May 1986, pp. 4-14.)



措施獲得輝煌成果：於一九八九年十月七日將共產黨易名為「社會黨」，揚棄力行四十年的馬列主義，回歸民主憲政；十六天後（即十月二十三日）再下一城，更改國號為「匈牙利共和國」，塗去原國號中具有共黨色彩的「人民」兩字，宣布與共產黨徹底決裂。而波蘭自一九八八年八月三十一日朝野舉行戒嚴後首次會談起，波共政權即遭到「團結工聯」(Solidarność)的嚴重挑戰，不出一年的時間，波共迫於時勢所趨，拱手讓出組閣權，由「團結工聯」推薦的馬佐維斯基(Mazowiecki)出組內閣，而在一九八九年八月二十四日成立戰後第一個東歐非共領導政府。正當匈牙利、波蘭熱中改革之際，其他東歐共黨領袖却大肆張揚要堅守共產主義，護衛共黨政權，但時勢比人強，匈、波改革熱流却防不勝防地滲入各兄弟國內，而激起更激烈的反應。首先，東德共黨頭子何內克(Erich Honecker)因不敵八、九月大批難民逃亡潮的壓力，於一九八九年十月十八日被迫下臺，由年僅五十二歲的克倫茲(Egon Krenz)取而代之，從而開啓了東德政經改革之門。繼同年十一月九日開放柏林圍牆之後，東德於十二月一日宣布放棄共黨專政地位，使東德政局邁入新境界，誰也沒料到，短短一個半月內，東德竟發生如此巨大的改變。其次，保加利亞自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十日吉日可夫(Todor Zhivkov)辭去總書記之職後，保共於同年十二月十三日中央委員會議中，通過放棄共黨在政府與社會中的領導地位，接受多黨民主體制的原則，並恢復宗教自由，使保國政局在一個月內煥然一新。緊隨保加利亞之後，捷克的改革速度更為快速。捷克自一九八九年十月二十八日舉行七十一週年國慶日當天，爆發反賈克斯(Milos Jakes)的示威活動以來，一波接一波的羣衆示威，迫使捷共最後於同年十一月十四日宣布放寬人民出國旅行限制，但仍不能抑止示威浪潮，這使得於一九八七年十二月十七日甫自胡薩克(Gustav Husak)手中接任捷共總書記之職的賈克斯，被迫於十一月二十四日下臺，改由烏班內克(Karel Urbanek)接任。幾經協商之後，捷克國會遂於十一月二十九日通過放棄共黨專政地位，並同意與反對組織合組聯合政府，三個星期內，捷克政局急轉直下，頗令人感到意外。最後，羅馬尼亞的變革更縮短時間，從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十六日廸米斯瓦拉(Timisoara)流血衝突開始，至十二月二十二日軍隊倒戈，僅僅一個星期之間，一場自發性的革命，即刻推翻統治長達二十四年之久的希奧塞古(Nicolae Ceausescu)政權。這種「加速度」的骨牌效應，幾乎令國內外研究共黨問題的專家感到不可思議。

就改革的幅度來說，各國至今的改革幅度相差無幾（請參照下表說明），然各國政局的穩定性，却有與變革速度之快慢成反比的傾向。經過這場政治大地震後，一切象徵共黨控制東歐社會的工具（例如：一黨專政、秘密警察或民兵、中央計畫經濟制度、限制人民出國旅行、新聞檢查等），幾乎蕩然無存。再者，共產黨在「人民起義」的壓力下，接受了政治多元化的事實，並且同意和所有政治勢力公開競爭，分享政治權力。同時，共黨為順應這股不可逆轉的民主潮流，亦徹頭徹尾地改造權力結構，大換新血，頒佈新黨綱，以一個全新政黨的姿態面對羣衆，過去「獨裁專政」的東歐共產黨，至今已不復存在。

表一 蘇聯與東歐國家改革進程對照表

製表日期：1990年2月10日A.f.u.

國別	波蘭	匈牙利	東德	捷克	保加利亞	羅馬尼亞	蘇聯
改革項目 (時間)							
非共領導政府(1)	○ (1989, 08, 24)	○ (1989, 10, 07)	×	○ (1990, 01, 18)	×	○ (1989, 12, 24)	×
放棄一黨專政	○ (1989, 12, 30)	○ (1989, 10, 18)	○ (1989, 12, 01)	○ (1989, 11, 29)	○ (1990, 01, 15)	○ (1989, 12, 28)	✓ (1990, 02, 07)
實行自由選舉	○ (1989, 06, 04)	△ (1990, 03, 25)	○ (1990, 03, 18)	△ (1990, 06, 08)	△ (1990, 5月)	△ (1990, 05, 20)	○ (1989, 05, 25)
更改共黨黨名	○ (1990, 01, 30)	○ (1989, 10, 07)	○ (1989, 12, 17) (1990, 02, 04)	×	×	×	×
引進市場經濟機制	○	○	○	○	○	○	○
解散秘密警察或民兵	○	○	○	○	△	○	△
撤離蘇聯駐軍(2)	✓	✓	✓	✓	×	×	✓
平反「布拉格之春」(3)	○	○	○	○	○	×	○
出國旅行自由	○	○	○	○	○	○	○
新聞自由(4)	△	△	△	△	△	△	△

1.凡內閣總理為非共產黨籍者，稱之為非共領導政府。  
 2.保加利亞與羅馬尼亞境內並無蘇聯駐軍。  
 3.羅馬尼亞並未派兵參與1968年鎮壓捷克事件的行動，所以無須加入平反「布拉格之春」的行列。

4.所謂新聞自由，乃指非共產黨或組織，可以自辦報社、開設電臺、出版刊物及廣告宣傳而言。

5.「○」表示該項改革案已被官方正式通過，而且已經開始施行；

「△」表示該項改革案已被官方正式通過，而準備施行；

「✓」表示該項改革案已被官方提出，但未被正式通過；

「×」表示該項改革案未被官方提出。

( ) 內的數字，表示該項改革案開始施行、準備施行、或被官方提出的日期。

了。

戈巴契夫的新政治思維的確爲東歐帶來了新的希望，快速且大幅度的變革，使整個東歐煥然一新。面對這場深具歷史意義的大變局，實有很多值得探究的問題，於此擬就以下兩個問題，提出扼要的解析：(一)東歐變革過程中，凸顯了那些特點？(二)變革中的東歐，表現出那些新的風貌？茲分別敘述如後。

### (一) 東歐民主改革的特點

東歐民主改革運動足以稱之爲——「故事精彩、節奏緊湊、劇情曲折、高潮迭起」的歷史大戲，細顧之後，我們可以將整個故事調理出底下七個特點：

1. 改革動力分爲三種類型。(1)由上而下型：匈牙利的改革是起自於共黨內部，其黨內改革派自從一九八八年五月擊敗卡達爾一幫守舊份子後，即主動下放權力，放寬限制，接受反對團體。雖然匈牙利沒有強而有力的反對團體，亦少見大型羣衆示威的造勢，但由於匈共的自覺與改革的善意，使整個改革過程異常地順利而且平和。(2)由下而上型：東德、捷克和羅馬尼亞是在大規模羣衆示威的浪潮下，迫使共黨屈服，進而開放改革，是由下而上的改革。其改革過程就不像匈牙利那般地平和，憤怒的羣衆常常有些激烈的反抗行動，其中又以羅馬尼亞處死希奧塞古一事最爲極端。(3)上下交互帶動型：波蘭和保加利亞的改革動力來自朝野雙方的互動作用，共黨和反對團體都能主動地提出改革方案，經談判妥協後，由國會表決通過，公布實行，這可算是前面兩者的綜合型。

2. 工潮與學運，頻頻奏捷。工人與知識份子（特別是學生）是這次改革運動的主要力量之一，一切大小抗議活動，幾乎都是由他們一手促成，抗議活動初期，共黨曾經動武鎮壓，而造成若干工人或學生的犧牲，但隨著罷工與罷課規模的擴大後，抗議活動所向皆捷，共產黨一一被迫加速改革。不過，各國工人與學生參與改革行動的程度却有所不同，一般來說，波蘭，是以「團結工聯」領導的工人力量爲主，學生的作用小；捷克、保加利亞和羅馬尼亞，則以學生的動作較大，支持性較高，工人僅僅採取象徵性的罷工活動以示支持，貢獻很少；而匈牙利和東德的工人與學生，則藉由加入工會和參與反對組織的途徑一起支持改革。

3. 教會頓成民主聖地。教會原是人民祈福的場所，與政治少有關係，但這次東歐改革中，除了羅馬尼亞外，教會却也成爲一股支持改革的力量。宗教領袖或牧師，常在宗教儀式過程中，散播「反共」訊息，使反對意識迅速提昇。而當反對組織與共產黨關係惡化時，教會人士亦常居間調停，幫助反對組織渡過難關。其中教會力量最凸顯的國家，莫過於東德與波蘭兩國，一次次起自於教會廣場的示威活動，已使東柏林的格特塞曼內教堂、萊比錫的尼古拉教堂和格但斯克的聖布里吉達教堂

，成爲人民爭自由、民主的聖地。

4. 環保團體頗能整合反對力量。環保團體可以名正言順地以提倡環保之名，批評政府不當措施，進而宣傳改革思想，集結改革派人士，使反對力量能有效地結合。其中又以保加利亞的「生態開放」環保團體最爲出色，這個團體和該國反對組織「民主力量聯盟」(Union of Democratic Forces)，已經成爲推動保國民主化運動的主要力量。

5. 共黨和反對團體都很理性。截至目前爲止，東歐各國的軍事權仍大多掌握在共產黨手中(除匈牙利外)，所以，有些專家預料東歐共黨會動用武力以挽回江山，但事實却不如此，東歐共黨目睹羅馬尼亞軍隊倒戈的慘劇和中共「六四屠殺」的後果，深自引以爲戒，已有放棄使用武力的打算。至於反對團體，則能有秩序的指揮羣衆，並利用「對話」與「圓桌會議」的機會，慢慢地、有計畫地提出改革要求(羅馬尼亞革命事件是爲例外)，使改革運動能延續下去。

6. 政經改革同時進行。政治與經濟改革同時進行，是此次變革的特點之一，然前者在速度、幅度及穩定度上都表現得比後者好，這主要是因爲：政治改革是一連串的「政治權力開放」措施，人民喜見這些新的獲得，因此，支持性高，進展較順利；而經濟改革方面，各國面對外債沉重、<sup>⑨</sup>通貨膨脹率劇昇、<sup>⑩</sup>工業現代化緩慢的問題，都考慮採取應急的「緊縮政策」，但由於人民的反應冷淡，且受匈牙利最近經改挫敗的影響，<sup>⑪</sup>使各國裹足不前，經濟改革的進程，遂告牛步化。

7. 改革訴求，大同小異。除了東德有「兩德統一」和保加利亞有「種族平等」的特殊訴求外，各國之訴求不外乎是實行自由選舉、打倒共產黨，採行多黨民主、尊重基本人權，與新聞自由等。

8. 各國都有以「論壇」(Forum)爲名的反對團體。例如：東德的「新論壇」、波蘭的「團結公民論壇」、捷克的「公民論壇」、匈牙利的「民主論壇」、保加利亞的「人民力量論壇」，這些組織都是各國國內主要反對組織之一，其中又以東德的「新論壇」和捷克的「公民論壇」，最爲凸顯，功能最大。

## (一) 變革中的東歐新貌

註⑨ 根據聯合國歐洲經濟委員會的報導，截至一九八九年初，蘇東國家累積外債達一千三百億美元，其中蘇聯四百一十億、波蘭三百八十七億、東德一百九十一億、匈牙利一百七十億、保加利亞六十九億、捷克五十二億、羅馬尼亞三十一億。如果扣除這些國家在西方銀行帳戶上的外匯存款三百億美元，則淨債務爲一千億美元。參見：毛蓉芳，「蘇聯東歐國家對外經濟關係的調整、改革及經驗教訓」，世界經濟，一九八九年八月，頁七十一。

註⑩ 匈牙利約爲百分之十六，波蘭高出百分之二百。參見「Fact of Eden-A Survey of Eastern Europe」, *The Economist* August 12, 1989, p. 7.

註⑪ 最近，匈牙利的經濟改革，非但没有好的績效，反而造成嚴重的通貨膨脹和消費物品短缺的現象，民怨四起，對政治改革產生不良的影響。參見 Joe Smolik and Theodore Malloch, "Financing Perestroika", *European Affairs*, 4/1989 Winter, pp. 17-18.

從東歐的變革看來，其社會主義體制已發生如下明顯的轉變：

1. 擺脫附庸地位，體現主權國家的風格。二次大戰後，東歐六國即落入鐵幕，淪為蘇聯旗下的附庸國，一切行為與政策皆唯蘇聯馬首是瞻。但這次變革中，因共黨的失勢（例如：失去專政地位，更改黨名、非共領導政府等，請參考表一）和戈巴契夫新東歐政策的影響，已使東歐各國慢慢地解下了蘇聯附庸的枷鎖，重新獲得國家自主權力，儼然成爲一個個道地的主權國家，「蘇聯集團」(Soviet bloc)一詞，已漸成不合時宜的歷史名詞了。

2. 政黨林立。東歐共黨一一放棄專政地位後，非共政黨即如雨後春筍般地迅速成立，根據西德明鏡周刊 (Der Spiegel) 的報導，目前，東歐各國平均約有四十~五十個政黨。<sup>⑩</sup> 由此可見，東歐國家已經由一黨專政轉向多黨民主，而具有政黨政治的雛型了。

3. 放棄中央計畫經濟，引進市場經濟體制。實行市場經濟是東歐各國一致的目標，但却有重重困難橫阻於前。四十幾年的中央計畫經濟已僵化了東歐各國的經濟發展，目前，各國如果要實行市場經濟制度，其最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莫過於如何引進價格體制、廢除配額限制、減少國家補助、採行私有制、和讓各國貨幣可以自由兌換。這些問題，實非缺乏市場經濟經驗的東歐國家所能立刻解決的，東歐經濟若要「脫胎換骨」，自然少不了一場艱辛、漫長的奮鬥過程。

4. 尊重人權與基本自由。過去，東歐人民從未享受過真正的人權與自由，但現在，尊重人權與保障基本自由的觀念，却漸漸地普遍化了，這可從三項事實得到印證：第一，東歐各國於去（一九八九）年底，陸續宣布解散秘密警察或民兵，使人不必再受到非法的盤查或監督；第二，開放出國旅行自由，使人民有自由進出國境和接觸外界的機會；第三，釋放政治犯，使過去因批評政府或帶頭起義的異議份子重獲自由，這正表示，政府准許民衆有言論自由，批評時政的決心。

5. 資訊傳播自由化。過去，東歐國家的傳播事業，完全受到共黨的控制，只有國營（即黨營）的報社、電臺、出版社才可能存在，而且書報刊物仍須登記、配給份額，不准自由發售，這使國內外消息不能迅速流通。不過，現在却完全改觀了，東歐各國內，已可以自辦報社、開設電臺、出版刊物，且可以自由買賣書報刊物，東歐人民已慢慢享受到同等於西方社會的新聞自由了。

#### 四、東歐民主改革的前景

影響東歐民主改革的變數很多，舉其要者有以下幾點：(一)戈巴契夫的領導地位；(二)經濟改革的成敗；(三)聯合政府的穩定

註⑩ Der Spiegel, Nr. 12/1990, pp. 214-220.



性；(四)共黨的改造程度；(五)軍隊的立場；(六)民族主義的傾向；(七)反對組織的團結性；(八)西方國家支援的程度。這些變數的發展如何，實關係著東歐改革的前途，而就目前整個改革過程來分析，東歐未來的發展似乎頗為樂觀，其理由有四：

(一)年邁保守的共黨領導人紛紛下臺，年輕有為的改革派領導人逐漸站上國家和黨的領導崗位，一些阻礙國家進步的思想、制度與人員都慢慢地被推翻，代之而起的是較有效率的新政府，新人新政，使國家機器可以迅速運轉。

(二)戈巴契夫的權位尚稱穩固，使東歐可以繼續深入改革。戈巴契夫目前所面臨的難題主要有三：1. 種族衝突嚴重；2. 經濟改革成效不彰；3. 保守派仍舊強烈反對戈氏政策。但這還不致於動搖戈巴契夫的領導地位，其理由有四：其一，戈巴契夫已利用多次人事調動的機會，將其親信引進權力核心，使領導階層中「親戈派」已佔絕對優勢，保守派很難有效地推行反戈政策。其二，戈巴契夫是人民代表大會 (The Congress of People's Deputies) 選出的國家元首，具有雄厚的民意基礎，而且人民代表大會中有過半數的代表支持他，<sup>③</sup>因此，要戈氏讓出元首之銜，實非易事。其三，戈巴契夫所倡導的「改造」(Perestroika) 與「公開性」(Glasnost) 政策已普遍受到國際社會的讚譽與支持，日益增多的經援與投資，使戈氏經濟改革成功的機會大為增加。其四，目前蘇聯內部尚未出現 (或正在醞釀) 足以取代戈巴契夫的政治人物，可見戈氏的權位仍是相當的穩固。基於以上的分析，戈巴契夫失勢的可能性極為渺小，而倘使近期內，蘇聯內部若無任何巨變，則戈巴契夫的改造政策可望繼續推行，東歐六國也可因此而更進一步的深入改革。

(三)東西方關係的和解，對東歐改革也起了正面的影響。其理由為：1. 東西方緊張鬆弛後，共黨將失去強制壓制東歐的藉口，使一九五六、六八年的武力鎮壓事件不致再發生，於是東歐國家有更寬廣的改革空間；2. 國際關係緩和後，東歐國家將可以削減國防支出，轉而投入經濟建設上，對經濟問題的解決有實際的幫助；3. 雙方對峙和緩後，則有助於互信互賴關係的建立，西方國家因此較願意幫助東歐國家解決改革中所遇到的困難。

(四)西方援助激增，為東歐改革開出一條新的出路。東歐人民因經濟生活未能改善，而漸對改革運動失去耐心與信心，使改革運動遭到莫大的阻力。正當此時，西方社會却雪中送炭地給予大量援助，使東歐改革再現生機。一開始就有「新馬歇爾計畫」(new Marshall Plan) 的提出，欲仿效戰後美國援助西歐重建經濟的「馬歇爾計畫」，幫助東歐渡過難關，但這項計畫究竟應由多邊的、官方的，還是商業的金融機構負責放款，却一直沒有定案，遂使該項計畫幾無進展。<sup>④</sup>隨後，歐洲共同體 (European Community; EC) 乃挑起援助東歐的大樑，除了負責籌劃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 (Organization for

註③ *Washington Post*, Oct. 20, 1989, p. A23.

註④ 同註③，pp. 17~22.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的援助計畫外，歐洲共同體本身也積極地採取行動。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二十四國於一九八九年七月巴黎高峯會議中，授權給歐洲共同體執行委員會 (the Commission) 草擬援助波蘭和匈牙利的計畫，九月二十六日提出五項援助方案，<sup>⑤</sup> 十一月中旬決定對波蘭、匈牙利各提供十億及五億歐幣 (European Currency Unit; ECU) 的援款。<sup>⑥</sup> 而在此之前，執委會早在一九八九年八月初，即公開招標一批價值一億三千萬歐幣的糧食援助給波蘭；同年九月十七日歐洲共同體又與波蘭簽訂一項長期合作協定，聲明協助波蘭重建經濟，<sup>⑦</sup> 除此之外，歐洲共同體還與匈牙利、捷克、蘇聯簽訂貿易合作協定，賦予最惠國待遇，使其商品更易進入歐市。而包括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二十四國在內的全球三十四個國家於一九九〇年一月十五日集會巴黎，商討成立「歐洲復興開發銀行」，預計至少募集一百二十億美元，對東歐六國提供貸款，以及經濟、技術援助。<sup>⑧</sup> 再者，歐洲共同體十二國於今 (一九九〇) 年一月二十日在都柏林舉行非正式會議時，亦達成對波蘭提供價值四千萬歐幣的糧食援助，和對羅馬尼亞提供價值四千八百八十萬歐幣的糧食援助及五百萬歐幣的藥物援助。<sup>⑨</sup> 其他國際性機構，例如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會亦表示支持援助行動，前者共提供波蘭三億五千萬美元的貸款，後者則於去年六月三十日共提供匈牙利三億四千五百萬美元的貸款，<sup>⑩</sup> 且將考慮減輕波蘭的負債，以協助波蘭進行結構改革。<sup>⑪</sup> 至於個別國家方面，美國除稍早曾提供波蘭一億美元的援助外，參議院於去年九月通過布希政府所提之十二億美元經援波、匈計畫，<sup>⑫</sup> 並於今年初號召十四個工業國家準備成立一個十億美元的「波蘭基金」(Poland Fund)，以協助波幣成爲可兌換的硬貨幣。<sup>⑬</sup> 法國總統密特朗亦公布一項爲期三年之六億四千萬美元的援波計畫，並將設立一個總額一億四千萬美元的投資基金，幫助波蘭經濟現代化。<sup>⑭</sup> 其他國家，例如西德、英國、日本、義大利等，也都有具

註⑤ 這五項援助方案爲：①重建波蘭農業；②幫助波、匈產品進入西方市場；③增加對波、匈的投資；④就業與管理訓練；⑤加強環境保護。

註⑥ Claus-Dieter Ehlermann, "Aid For Poland And Hungary, First Assessment," *European Affairs*, 4/89 Winter, pp. 23-27.

註⑦ Edmund Neville-Rolfe, "EC Aid to Poland," *EU European Trends*, No. 4, 1989, pp. 52-53.

註⑧ 工商時報，民國七十九年一月十六日，第四版。

註⑨ 法國經濟時報，一九九〇年一月二十二日，轉自國際經濟情勢通報，第八一九期，民國七十九年二月八日，頁二。

註⑩ *China Post*, Dec. 19, 1989, p. 5.

註⑪ Richard C. Longworth, "EC Fosters Change In Eastern Europe," *Europe*, November 1989, pp. 24-26.

註⑫ *Washington Post*, September 21, 1989, p. A37.

註⑬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January 4, 1990, p. 6.

註⑭ *Business Week*, November 13, 1989, pp. 27-29.

體的援助行動。總而言之，西方國家基於政治或經濟利益的考量，都相當樂意加入支援的行列，隨著東歐國家政治改革的加速，預計經援東歐的數目將繼續增加，東歐的經濟亦有可能出現轉機。

基於以上的理由，東歐民主改革的前景應是樂觀的。不過，必須注意的是，東歐民主改革在短期內是不會有大幅度的成效，並且我們仍不排除今後改革中會產生更多波折的可能，但經過一段時間的調整與整頓後，改革可能深入發展而取得更豐碩的成果。未來的東歐，是一個不偏不倚的中立地區？還是個仍與蘇聯結盟的集團？抑或是西方國家的新夥伴？各方多所猜測，尚無一致的結論。然專家們大體認為，未來的東歐較有可能朝向「芬蘭化」(Finlandization)的中立體制發展，概因芬蘭化是「小國毗鄰大國的生存模式，她採取一種不觸犯(蘇聯)的外交政策(non-provocative foreign policy)和內政自主自決的措施」，<sup>②</sup>這種模式對於目前仍與蘇聯關係「藕斷絲連」的東歐六小國來說，是個頗為合適的生存方式。但今年二月七日蘇共於中央全會中宣布放棄共黨專政，準備實行多黨政治後，為蘇聯——東歐關係投下一個變數。未來的蘇聯不是能夠實行真正的民主，讓東歐國家擁有外交、國防政策上的自主權，而使其擺脫目前極類似「芬蘭化」的尷尬身份，成為真正的獨立國家，這實在是個尚待細加研究的問題。

## 五、結 論

東歐變革所產生的強大震撼力，已使其周遭的國家、地區或組織產生了強烈的感應，彼此間的關係也因此而被迫重新調整，茲說明如下。

(一)對蘇聯與東歐關係的影響。蘇聯與東歐的關係(以下簡稱蘇東關係)，在這次改革中起了相當程度的變化。首先，在政治方面，雙方合作性將逐漸降低：戈巴契夫依其新政治思維的構想給予東歐國家政治自主的權力，這使原本維繫蘇東關係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和共黨領導遭到徹底的破壞，因此，未來蘇聯與東歐六國在政治合作與政治立場上是否能像以前那樣的一致，實在值得懷疑。其次，在經濟方面，雙方關係雖有分離的傾向，但短期內其互賴程度仍然很高，其理由有三：其一，經互會(Council for Mutual Economic Assistance; CMEA)各成員國雖因蘇聯的改革政策而獲得較多的經濟自主權，但因為目前蘇東國家的改革進程還未深入，所以短期內，還不能夠出口高品質的商品到西方市場，因此，蘇東與西方國家間的貿易不可能大幅度成長，蘇聯與東歐仍將是對方的最大貿易夥伴。根據西德艾本豪森(Ebenhausen)國際事務研究所

尤根·納賽德博士 (Dr. Jürgen Nötzold) 的研究，經互會成員國間的貿易量仍將佔其對外貿易總額的百分之六十。<sup>②</sup> 其二，蘇東國家透過一九七一年簽署的「社會主義經濟一體化綜合綱領」(Complex Programme for the Further Intensification and Perfection of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Socialist Economic Integration of the Member Countries of the COMECON) 與一九八二年簽署的「截至公元兩千年科學與技術發展綜合綱領」(Complex Programme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up until the Year 2000)，充分地分工合作，生產技術產品，<sup>③</sup> 使得雙方經濟生活互賴程度相對提高，除非蘇東兩方同意放棄這兩項合作綱領，否則雙方合作的關係仍將存在。其三，蘇東國家的經濟關係因經互會的設立而更形密切。今年一月九、十兩日在索菲亞 (Sofia) 召開經互會第四十五屆高峯會議時，捷克曾有「解散」經互會的要求，但因共識不足而告作罷。最後，僅能對該組織進行「改革」，所以，蘇聯與東歐的經濟關係將因經互會的繼續存在而再延續下去。

(二) 對東西歐關係的影響。東歐變革對東西歐關係的重大影響，有三：其一：「歐洲共同體」與「經互會」於一九八八年六月二十五日於歐市總部布魯塞爾發表聯合聲明，正式建立關係，使歷經十五年的談判，終於獲得突破。歐市與波蘭、匈牙利、捷克、蘇聯先後簽訂貿易合作協定，給予優惠進出口條件，雙邊貿易因而有顯著增加。其二，「經互會」也因東歐情勢的轉變而興起大幅改革，該組織於今年初第四十五屆高峯會議中，就針對其組織章程和「以貨易貨」的貿易系統，提出重大修正，會中決定接受蘇聯的建議，於一九九一年以前，採用可兌換貨幣和世界市場價格為基礎的交易模式，<sup>④</sup> 預料東西歐的貿易將因此而更為加強。「經互會的結構改造」加上「歐市一九九二年單一市場整合計畫」，使「泛歐經濟統合」(Pan-European Economic Integration) 不再只是個夢想，屆時其強大的經貿實力，將對世界經濟居主導地位，影響至為深遠。其三，東歐的變，使東西德統一問題，成為熱門的話題，不管統一後的德國，是個中立國，還是個北約盟國，都將對歐洲權力均勢造成重大的影響。

(三) 對國際局勢的影響。未來東西方關係最引人注目的，乃是北約和華約的互動關係，兩大軍事集團隨著東歐局勢的轉變，已由軍事對抗的層次，轉向政治對話，使裁軍進程獲得重大突破。雙邊於今年二月十三日加拿大渥太華「開放天空」會議中，同意將中歐部隊各裁減至十九萬五千人，<sup>⑤</sup> 此外，美國國防官員也準備在下回談判中提出將美蘇中歐部隊再減為十萬人

註② Jürgen Nötzold, "Several European Economic Blocs? The Future Significance of the COMECON," *Aussenpolitik*, III/89, pp. 277-292.

註③ 張晶，「評蘇聯和其他經互會國家貿易經濟關係發展的現狀問題及前景」，世界經濟，一九八九年三月，頁五六—六。

註④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January 11, 1990, p. 1.

註⑤ 中國時報，民國七十九年二月十五日，第七版。

的建議。<sup>②</sup>這正可說明，東西方的冷戰氣氛已逐漸緩和，而形成戰後最和睦的階段，對國際局勢將大有裨益。除此之外，東歐的改革，也使國際組織接納東歐國家的意願提高，例如歐洲理事會（Council of Europe）於去年十一月十六日接受了匈牙利的入會申請，捷克也可望成爲繼匈牙利、波蘭、南斯拉夫之後第四個加入世界銀行的東歐國家。<sup>③</sup>凡此以觀，東歐國家未來在國際社會上，將能夠扮演更活潑、更重要的角色。最後值得一提的是，美國已表示將放寬「多邊輸出管制協調委員會」（COCOM）<sup>④</sup>對東歐輸出高科技產品的限制，使一些中級科技產品（例如電腦、電訊設備等）得以輸出到東歐國家。這種放寬科技輸出標準的做法，可能會加快東歐國家工業現代化的脚步，未來的東歐，有可能成爲西方國家在國際市場上的新競爭對手，而影響國際經濟市場的比例分配。

東歐民主改革運動，對其本身和周圍的國家或地區，都產生了相當程度的影響，到目前爲止，可以肯定地說，這些影響都是良性的、富正面意義的，但從長遠看，若要持續這種好現象，則須滿足以下三個條件，否則很難達成：

（一）戈巴契夫繼續擔任國家元首之職。從上述的分析，東歐的改革在短期內是不會有大幅度的成效，因此，須要繼續改革才能見到成果，而要繼續改革實決定於目前這種客觀環境是否能夠維持。倘若戈巴契夫能繼續連任五年，則東歐國家將可再度拜戈巴契夫之賜，再行深入改革，到那時候，東歐才能有較穩定的局面，對世局也才能有正面的影響。

（二）蘇聯境內不會發生足以瓦解蘇聯聯邦共和國的獨立運動。如果發生不可收拾的獨立運動，戈巴契夫是很難再予容忍，而可能會強力壓制獨立運動，並同時會加強制約東歐盟國，以防止強烈的改革效應波及蘇聯。

（三）西方國家仍須繼續支持東歐改革，但應避免過份擴張其在東歐的政經勢力，否則，一旦觸動蘇聯的利益，則情勢將起重大改變。莫斯科新聞週刊曾於一九八九年八月發表評論指出：「只要不對蘇聯的外交政策利益構成威脅，蘇聯當局歡迎東歐國家嘗試市場經濟及多黨政治體制」；<sup>⑤</sup>此外，戈巴契夫也曾警告美國，「勿利用東歐國家目前的迅速變革，妄圖推翻共產主義……克宮決定讓東歐國家享受更多的政治自由，條件是美國不得趁蘇聯內憂之際占盡便宜。」<sup>⑥</sup>由此可見，蘇聯並非完全放棄東歐，假使蘇聯不能保住自己的利益時，很可能會作出較激烈的動作，而危及歐洲的和平。

（民國七十九年二月二十八日完稿）

註<sup>②</sup> Time, February 12, 1990, p. 17.

註<sup>③</sup> 同註<sup>②</sup>。

註<sup>④</sup> 「多邊輸出管制協調委員會」(The Coordinating Committee for Multilateral Export Controls)，一九四九年成立於巴黎，其宗旨在於防止西方國家高科技產品流入共產國家，四十多年來成效顯著，至今有十七個會員國。(參見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Dec. 18, 1989, pp. 1 & 5.)

註<sup>⑤</sup> 聯合報，民國七十八年八月三十一日，第十一版。

註<sup>⑥</sup> 中央日報，民國七十八年十月二十三日，第七版。